

刘天怡:扎根大西北的经济学家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

66 刘天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学问横跨多个经济学分支,在理论经济学、中外经济史以及人口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

刘天怡,四川筠连县人,1914年3月出生 于一个贫民家庭,5岁丧母,9岁时过继给伯父。伯父是老同盟会员,在其资助下,先生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1936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入重庆,师从著名经济学教授白瑜先生。白瑜在教学中,善于把西方的经济理论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主张富国强兵,抗日救亡。他的人品学问,使刘天怡大受裨益。1941年刘天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之后又在白瑜的指导下,致力于财政金融研究,曾受聘于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任研究员。1947年春他在《大公报》发表《根治目前经济危机的方案》,其中提出币制改革的主张;同年8月赴美留学,就读于丹佛大学经济学院;1948年获硕士学位,即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先生毅然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业,怀着报效国家的赤诚之心,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受到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接见,由此奠定了他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1950年夏,先生进入设在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冬结业,报名赴兰州大学任教。从那时到1992年去世,先生一直在大西北的这所高等学府工作,历任兰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人口理论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

在大西北工作生活的40多年间,刘先生虽然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屡屡被迫中



断正常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更改研究方向,但始终以一个学者所特有的执着与胸怀,践行着“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校训,在每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能够作出开拓性的贡献,令同代学人赞叹不已。先生的教学活动所包容的知识极为丰富,曾先后讲授过“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学”、“外国经济史”等八门课程。他是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批在该学科取得学位授予权的经济学家,并为我国培育出首批外国经济史硕士。先生教学方法独特,以启发式、示范式为先导,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虽为著名学者,但对学生如朋友。他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视品德修养高于知识修养,常以“宁可德大于才,不可才大于德”教导学生。他本人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刘天怡先生学贯中西,既有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训练。其教学与研究领域跨度大,涵盖范围广”。主要涉及以下五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留学期间,刘天怡先生就丁下

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学术功底,接受了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系统训练。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具有话语权的学者。他在宏观经济学方面具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对凯恩斯经济学具有独到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经济权威刊物发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长文,代表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在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文章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普遍关注,提升了兰州大学经济学学科在全国经济学院系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个领域是外国经济史。刘天怡先生是中国外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参与了这个学科的建设。他最先提出把外国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的主张,并以精辟的见解、独特的思辨方法论证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阐述了他所首创的外国经济史体系,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生的代表作《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2期),系“文革”后首个探讨学科建设体系的论作。该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学科体系分

类方法,即历史分期和国别经济史有机整合的方法。专著《外国近代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按照他本人提出的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尚未出版时,即以油印本形式在国内数所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资料;正式出版后,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第三个领域是人口资源环境学。他是我国西北人口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创办了兰州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及《西北人口》杂志,并出任第一任所长兼主编。其代表作《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以资源环境约束视野看待区域移民问题,在1984年北京“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后,受到中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而《谈谈美国发展经济时期的人口政策》(《经济研究》1981年第10期)等文章,则是先生试图用比较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成果之一。刘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1983年4月,他根据甘肃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的需要,专门组织老师和学生前往会宁县进行调查。经他修改审定的调查报告《会宁县人口与经济发展途径的初步研究》发表后,受到国务院“三西”(甘肃河西、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建设领导小组及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成为“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有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都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的指导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之一。先生在陕、甘、宁、青诸省组织的多项人口调查,包括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对于政府决策层有关西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的形成,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多半基于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和在中国历史经典文献研究上的知识积淀。这个方面的著述如《孔孟经济思想批注》(《韩非子经济思想资料》)(《管商荀韩经济思想资料选注》)等,足以显示先生在这个领域的造诣。而应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邀约为新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所撰写的《龚自珍经济思想评价》、《魏源经济思想评价》等词条,则代表了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五个领域是外国经济理论译著。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掌握当时国际理论界对凯恩斯研究的最新动态,刘先生翻译了不少资

料。甚至在“文革”期间,刘先生刚刚从“牛棚”被放出来,还偷空翻译了《近20年欧洲经济概况》一书。这本书是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编辑出版的《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欧洲经济》(1972年纽约版)一书摘译而来,约20万字。1982年8月,为了解决国内人口学教材不足问题,刘先生不顾68岁高龄,亲自担纲,组织翻译了美国人口资料《人口手册》(国际版)及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所著《人口学》一书。一年后完成,对于当时我国刚刚起步的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我1980年考入先生师门下读研,1982年留校任教,1992年亲历先生逝去,前后追随恩师12年。其间先是作为学生接受其耳提面命授业两年,后为同事兼助手,接班本科教学工作,与先生共事整10年。

十几年师生情谊,先生给我的印象可归纳如下:其为人可谓谦谦君子,其为师践行了因材施教激励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其道徳修养多半基于修身齐家治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学界常言,做学问须先做人。说到做人 and 为人,先生践行了儒家所谓君子之道,仁、智、勇兼具,以仁人之心待人。这点放在先生身上恰如其分。先生宽厚大度,常以手书“心底无私天地宽”自勉而勉人。先生表面看上去柔弱书生相,但内在有勇者的素养——勇者不惧。何以为证?新中国刚成立他就中断在美学业,毅然弃学回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短暂的革命教育之后,选择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携妻挈子到兰州大学,无怨无悔,把一生献给了兰大,献给西北的教育事业。此诚所谓勇者也。

先生为师,把西方教育精神和儒家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年我们读研期间,他特别注重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上则鼓励我们自己去探索,且要求每个人都博学多文。他本人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亦写有大量诗词佳作,书法有“雪松之体”。而今回味,这恰是在践行个性化的教育,也是在实践中因材施教。得益于先生这种教育,师门几人选题各异,创新精神得到激励。后来在工作中,个个学有所长,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一定的贡献。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告慰于先生面前的。

市场、投机和政府为什么是创新经济的必备要素?

■ 郑渝川

威廉·H. 詹韦是华尔街具有传奇色彩的 投资人,拥有40年现代风险投资的职业经历,创立和领导了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技术投资团队,并因此为IBM等计算机、互联网巨头企业成长提供了关键助力。他所著的《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一书,令人惊叹的解析了政府、私人企业创新、金融资本对于创新经济各自起到的作用,指出私人企业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政府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当代政府在投入科研经费以引导创新中扮演着关键作用——当然,创新的资金更多的是来自于金融资本,后者具有显著的投机性,会制造经济的不稳定,助推了资产和信贷泡沫。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包括全球范围内广受争议的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全球顶级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里乌埃尔·鲁比尼,著名互联网投资人、创业家马克·安德森等人的鼎力推荐。

全书开篇就指出,要推动创新经济发展,在上海就需要持续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资源。这其中,政府投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美国的创新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府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网络。而更为细分的科学技术领域、产业领域,即创新经济的下游,金融资本热衷进入其中。应当看

到,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虽然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确实支持过农田灌溉系统、铁路、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等重大技术创新的推广,但同时也会制造泡沫,而使得部分重大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推广陷入波折。如果我们认同熊彼特有关“破坏性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的观点,那么,就应当容忍经济创新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如投机造成的泡沫在部分时期和领域造成了效率损失。

作为长期扎根于华尔街,并且对于美国工业界和硅谷有着很深了解的投资人,威廉·H.詹韦指出,创新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市场、投机和政府三者中任何一员。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力主政府干预经济经济学家,会频繁提及市场失灵,而自由市场论的支持者则会谈到“政府失灵”。威廉·H.詹韦指出,“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都或多或少依赖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测性推测。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老牌的赢利企业,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严格计算支出和预计收益来达到最佳管理目的。”所以,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不应以中短期的投入产出比来判断是否出现了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

全书结语中也分析指出,包括美国在内,而今炒得很热的数字经济和低碳经济,其实都建立在大量国家投资的基础上,在形成了产业规模并确定了标准之后,才吸引了大批金融资本的进入。

《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书中讲述了威廉·H.詹韦本人职业历程、投资经历,介绍他本人对于金融资本影响实体经济、创新经济发展的观点的由来。在他看来,华尔街1975年开始,就通过院外游说等方式,使得美国官方对于资本市场的管制逐步得以解除,彻底改变了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增强了竞争强度,使得证券经纪被迫以底价竞争。竞争压力下,投行不得不努力开发新的产品,而这又得到了存款保险及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所提供的清算保障。这些在金融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刺激了金融冒险的踊跃。所以,等到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更为激进的金融理论出现,金融冒险跃进,就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

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恰恰可归于政府和投机相结合所驱动的混合产物。就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来看,基础技术最早来自于美国军方,而后这一产业从纵向集中型转变为横向多层次的、分布式的,转变过程中金融资本的驱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威廉·H.詹韦本人就曾主持过对计算机产业领域的激进创新的投资,努力通过金融创新工具来对称完全无法量化评估的创新项目的风险。他分别引入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等人的观点,指出创新经济与风险无法剥离。而



美国创新竞技发展的实践则说明,投入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本身,也有赖于该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基金会的巨大资助。

如前所述,1975年后,华尔街投行的金融创新,可以获得美联储及存款保险的兜底支持,这种做法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被经济学家普遍抨击为制造和放大道德风险,造成了华尔街投行“大而不倒”的危险状况——但书作者指出,也正是因为金融创新有了兜底,完全不懂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等前沿科技的投资人,才可能将钱慷慨的投给科技创业家,包括比尔·盖茨、乔布

斯等人,并有着很强的耐心。这种连带效应在美国也被讽刺性的称为“硅谷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创新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泡沫的膨胀,本身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结果的一体两面,无法予以剥离,不能只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而根据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泡沫和风险都是创新经济发展所需要忍受的代价。书作者甚至认为,因为创新经济所能加速聚集财富,因此,有助于“将财富转移到侥幸的投机者和有洞察力的企业家身上”,从而起到聚集更多资源来支持风险不可预知的科技创新的作用。

关于经济学家的影响评价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林毅夫作为影响力较大的经济学家,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尚未平息,近日又因“吉林报告”引发以田国强为代表的争论,林毅夫的影响成为“林毅夫团队”的压力。前不久,有人提出“经济学家越来越没有用”,认为“经济学家是一群被过度信赖但名不副实的名利之徒”,他们继而说“经济学家预测对房价了吗?预测对金融危机了吗?互联网的兴起与经济学家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把经济学家说得一无是处,负面影响堪忧。

那么,对经济学家的影响该如何评价呢?

谈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经济学家”这个概念。

有的认为,经济学家是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人,其衡量标准是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理论。我个人认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理论家。由于经济理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学科体系也在不断扩展,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因此,“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必须有一定的包容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比如,会计学家、审计学家完全可以纳入到“经济学家”的范畴。比如,经济史学家、经济管理学家也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家。对于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比如从事经济社

会学的理论家,可以是社会学家,也可以是经济学家;再比如,从事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家,可以是地理学家,也可以是经济学家。但是,对于从事经济预测理论的,我认为他们是“预测家”,不能是经济学家。因为“预测”是无边际的,有“赌”的成分,难以预料的东西很多。这与“经济学”所探讨的“规律性”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综合考虑,经济学家就是指在经济理论(包括部分涉及经济学的边缘及交叉学科)中有一定造诣、有原创理论的人。

影响是指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来作用或改变。从经济学家的职业看,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成果——可能影

响高层决策、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政策、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及经济生活。而“影响力”如何,还得具体看学术平台、学术职务、学术研究领域、社会历史背景、经济环境形势等。所以,分析研究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困难多,学术成果不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影响”难以判断。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为什么获奖人几乎总是年龄比较大的,这方面的考量是毫无疑问的。

我记得广东经济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过由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主编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全套8册),该书在北京召开了论证(编辑)委员会会

议,邀请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经济学家作为推荐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真正有影响力的百位经济学家,经过充分讨论并投票,最终确定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百位经济学家入选名单。从这套书的内容看,对入编的经济学家只是收录几篇学术代表作品和个人自传。(该书改叫“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作品选”可能更恰当)当然,所收录的代表作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具体这百位经济学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该书没有解读,自然没有“答案”。这也许正是评价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影响的“困难”所在。(下转 02 版)